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LEWIS MUMFORD

刘易斯·芒福德经典著作系列

机器的神话(上):

技术与人类进化

[美]刘易斯·芒福德 著

宋俊岭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刘易斯·芒福德经典著作系列

# 机器的神话（上）： 技术与人类进化

[美] 刘易斯·芒福德 著  
宋俊岭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5-028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机器的神话(上):技术与人类进化/(美)芒福德著;宋俊岭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3  
(刘易斯·芒福德经典著作系列)  
ISBN 978-7-112-17906-0

I. ①机… II. ①芒…②宋… III. ①城市规划—文集 IV. ①TU98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7813号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Copyright: © Lewis Mumfor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大苹果著作权股份有限公司代理,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正式授权我社翻译、出版、发行本书中文版

丛书策划:张惠珍 董苏华  
责任设计:董建平

责任编辑:董苏华 姚丹宁  
责任校对:李欣慰 姜小莲

刘易斯·芒福德经典著作系列

**机器的神话(上):技术与人类进化**

[美] 刘易斯·芒福德 著

宋俊岭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3<sup>1</sup>/<sub>4</sub>。字数:405千字

2015年6月第一版 201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48.00元

ISBN 978-7-112-17906-0

(2715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10003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图 目

我荣幸从1962年4月开始在我母校——纽约城市学院——开设了J·C·沙波什尼科夫（Jacob C.Saposnekow）系列讲座。这些讲座文稿，连同其后来的姐妹篇，都正式入选为该校纪念一位著名学者、有远见的市民、忠诚的校友的图书中。该书中某些主题，起初就是这批讲稿前三章中首先勾勒出来的。我感谢赞助人，萨迪（Sadie）和R·沙波什尼科夫（Rebecca Saposnekow）女士，感谢学校方面允许我将这批资料并入这部专著。所以，若认真说，这部专著其实从那时已经开始运笔了。

# 目 录

第一章	前言	1
第二章	人类的聪明才智	18
第三章	古老的梦幻时代	66
第四章	舌头的厚礼	97
第五章	寻找与制造	129
第六章	驯化动植物的准备阶段	161
第七章	园地、家居、母亲	177
第八章	大变动始于国王	199
第九章	巨型机器的设计成功	257
第十章	“文明”的重负	283
第十一章	发明创造与艺术活动	306
第十二章	机械化的先锋	338
	参考文献	373
	索引	401

成一种消极被动、无目的性、服从机器操控的动物，其最适合的职能，按当今一些技术专家的解释，就是填充机器，或者，就是在严格控制下仅仅去为违背人性的机体组织卖命效力。

在各种科学假说和推断引导下，人类如今不仅听命于当今科学技术进步的各种成果和形式，而且把这些进步本身当成了目的。我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质疑和剖析这些假说和推断，我首先罗列各种证据，

4 质疑当今有关人类基本属性的种种理论学说。这些理论对于工具在人类发展进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包括当今机器所发挥的作用——都估计过高了。卡尔·马克思断言，生产过程中物质手段在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占有核心地位，而且发挥了导向作用。我认为，他这一论断是错误的。而且，不仅如此，法国神甫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1882—1955年，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1923—1946年在中国研究人类学，为北京人的发现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无论在精神思想还是在社会生活上，人类都处于不断进步的状态，直至形成精神统一。——译者注）那些貌似温良宽厚的解释，把人类当今狭隘的技术理性主义解读为人类进步的全部历程，甚至还引申为人类未来的最终状态，届时人类继续发展的任何可行性都将终结。在这样一个终点位置上（omega-point，也译灭点，即透视构图中假想无限远位置上的视觉总汇点。——译者注），人类最初的自为能力和人类本性也将丧失殆尽；大约只剩下了组织化的聪明才智：而那将形同专门产出抽象思维的产蛋鸡，到处都是且无所不能，却既不懂得爱也不懂生活。

事实上，假如我们不去深入探察人类历史上的古老属性，我们就没有希望弄清楚技术在人类发展进化过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可是这种深入的探察在19世纪当中就被严重干扰了，被遮盖得含混不清；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大量新技术发现和发明陡然增多，几乎把古代的研究成果和遗产积累一扫而光。对于人类自身局限性和技术能力的传统理解，也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

我们当今文明的先行者们，往往把他们特殊的机械技术成就和进步方式与那些毫无道理的道德优越感混为一谈，这是非常错误的。维多利亚时代有一种信仰，相信通过掌握机器，人类其他一切组织制度和习俗规约必然都能大大改进；当今的人本来能够抵制、拒绝这种无

根据的信仰。但是，当代人却仍然以疯狂的热情集中精力继续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仿佛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人类找到自身救赎的唯一手段。其实，当今人类之所以过分地相信和依赖科学技术，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人类发展进步的整个历程存在严重误解。因此，要克服这种偏差，为了让人类恢复自身的平衡，首先就要把人类的发展进步，从原始人类至今的全过程中的主要阶段，都一一清楚展现出来，仔细予以观察分析。

人类生存离不开工具，如今这一论点几乎成了天经地义的结论。而也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警惕，不要过分强调石器工具的作用；因为在数十万年之前，这些工具尚未完成功能分化，尚未变成完全有实效的应用工具。但是，长期以来，多少生物学家和文化人类学者都把制造工具看做远古人类生存的核心手段和内容。与此同时，他们却低估了、甚至完全忽略了许多其他物种也有的，甚至比人类更加灵敏而熟练的，更加丰富的生存技能和活动。而且，尽管许多著名的文化人类学者和考古学者都提出了反证，包括 R·U·塞斯 (R.U. Sayce)、D. 福德 (Daryll Forde) 以及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 (Andre Leroi-Gourhan) 等，却仍然有人顽固地要把工具和机器等同于技术：这就无异于以局部取代了整体。

即使是描述技术形态中物质构成这一部分内容时，他们的观点和做法，也往往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容器的巨大作用：古人类的炉火盆、窖穴、狩猎陷阱、绳索与索具；以及稍晚些时候才出现的筐子篮子、箱子匣子、各种牲畜棚舍厩栏，以及人类的家居住宅……更不要说一些更晚时期出现的大型集团性容器，诸如水库、运河、城市，等等。5 技术形态当中这些静态的构成要素，同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举例来说，在我们当代，就有高强度转换器、巨型化学反应罐，以及原子能反应堆，等等。

技术有许多定义，而任何一种充分而清晰的技术定义都必须承认，许多昆虫、鸟类、哺乳类动物，早就创造出了先进得多的容器。他们那些精致无比的鸟巢、窝穴、隐蔽所、几何形结构的蜂巢、类似城市的蚁塚和白蚁巢、海狸构筑精致的巢穴等，都远超过人类祖先制造工具时表现出的才干，直至后来智人出现。简言之，假如单看技术的有效性就足以判别智力水平，那么，人类与其他许多物种相比，在很长时期内始终是个落伍者。这一推论的结果几乎就不言而喻了：就是说，

仅就工具制造技术而言，毫无新意可以证明人类的特殊性，直至人类具备了语言符号、审美形象，以及可以在社会群体中传播和共享的知识。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是人类的大脑——而不是人类的双手——才真正成全了人类真正的与众不同。而这样的大脑，不可能仅仅是双手劳动的产物。因为，在一些四脚爬行的动物中，如鼠类，其大脑就已经非常发达，尽管鼠类并没有十指运用自如的双手。

一个多世纪以前，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年，苏格兰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其写作风格大量使用典故和传说，思想观点偏重鼓吹人类需要强权人物。主要作品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等。——译者注）就将人类定义为“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就仿佛，凭借这唯一特点，人类就与众不同，就高高超越整个野兽世界。如此过分强调工具、武器、物质器具以及机器制造的作用，反而让人看不清人类进化的真正道路。把人类定义为使用工具的动物，即使是后来更正为“制造工具”的动物，在柏拉图看来，也是离奇古怪的。因为，他曾经把人类的出现，人类能够从其原始状态进化为人类，归功于音乐发明者玛尔绪尔斯（Marsyas）和奥菲士（Orpheus，与前者玛尔绪尔斯都是希腊神话中的神灵和歌手，善于弹奏竖琴，歌唱时鸟兽谛听，顽石点头。玛尔绪尔斯还曾与天神阿波罗比赛演奏竖琴。——译者注）归功于从天上偷得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或者，归功于冶炼火神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也就奥林帕斯万神殿中唯一的体力劳动者。

然而，人类“实质上是制作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已经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假如在一堆砍削过的鹅卵石附近，又偶然发现一些小型灵长目动物的颅骨碎片，就会被其发现者，比如利基博士（Dr. Leakey），当做充分证据，说这种生物就属于人类的直系祖先，甚至忽略它与猿类及其后人类有明显体貌特征差异。非洲发现南方古猿遗骸时，不就有过这样的推论吗？因为里基博士这种所谓类人猿的脑容量只有智人的三分之一——它甚至小于猿类的脑容量——即使有砍削粗石器和使用石器的有限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却既不需要，自身也绝对产生不出人类才具有的这种丰富智能水平。

假如非洲南方古猿能够制造工具，却没有人类其他特征，连这些

特征最初级的形式也没有，那么这只能证明，除了真正的人类（the genus Homo）以外，至少还有一个物种也具有这种特性，恰如鹦鹉和鹊鸟同样具有人类清晰的语言能力，以及，某些鸟类为了装饰目的而能够修饰自己的隐蔽所一样。可见，任何一种孤立特性——甚至包括制造工具本身——也不能够充分体现人类特征。人类专有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在于，人类能够把范围极其广泛的各种动物根性（animal propensities）都组合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文化整体：亦即所谓人性。 6

其实，制造工具和制造器皿，从功能上看是完全一样的活动。假如早期调查研究者能够及时发现并且认识到这种共性，他们就会清楚看到，人类手工制造的石器工具和器物，其实并没有任何特别值得注意的，直至很久以后人类发展实现了另一种结局。甚至就连人类的远亲大猩猩，也能把大量树叶集合到一起，制作成一个安乐窝。或者采集一些蕨类植物的茎秆在浅浅溪流上草率搭成一座小桥，以免过河时打湿或者扎伤双脚。而人类的五岁儿童，虽然可以讲话，可以阅读，可以简单推理，其使用工具的能力和悟性却可能很差，更不要说制造工具。所以说，假如说制造工具也算一个决定因素，那么，它也决不能构成确定人类的充分必要条件。

所以，如今我们有理由怀疑，古代人类身上是否也有过同样的灵巧，换言之，有过同样的笨拙？在为人类优越于其他生物伙伴寻找证据的时候，我们不一定非把自己局限在那些粗劣石器上，而完全可以另辟蹊径。或者，我们还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在发明出精制工具之前的漫长年月里，古人类干什么去了？既然采用同样材料，以同样纯熟的肌肉动作敲打石头，他们不是完全能打造出更精美的工具吗？那么，那么漫长的年月里，他们又去关注什么活动了呢？

原始状态的人类技术活动中，大约除了用火和维持火种的技术之外，再没什么特别内容可以算作人类专属的东西；直至后来，人类通过经常运用某些器官来完成本不属于它分内的任务，在此过程中，就形成了人类自己专门的身体器官。这种变迁过程中第一个有重大价值的转换，就是四足动物前肢的变化；它从原来专门用来行走的器官，转换成能够履行多种职能的器官，包括：攀缘、抓取、击打、撕扯、反复锤捣、挖掘、拥抱、抱持等等。杜布鲁尔（Du Brul）指出，古人

类双手和石器工具之所以能在人类进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它们已经完成了十分重要的前期准备，让前肢来履行原本由嘴巴担任的咬、叼、含（以便浸润食品）种种职能，这就让嘴巴解放出来，准备学习说话。这一转换，意义非同寻常。

所以，假如一定要说人类是制造工具的动物；那么，人类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个原始的，无所不能的工具；而且，是比后来其他一切组合都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类由大脑支配的身躯（his own mind-activated body），包括其全副部件，当然也包括能够制造棍棒、手斧、木质投枪等器具的有关器官。古人类的劳动效能当然极其原始，为了补偿这一缺憾，他有个很重要的资产，这资产能大大扩展人类的技术天地：人类具有一整套其他任何物种都不可比拟的丰富的生物学装备，这就是人类的身体和大脑。人类身体，这可不是为了完成某种单一专门活动设计出来的；而人类的大脑则能够扫描非常广阔的生存环境，能够把生活动中众多不同要素组合成整体。正由于人类自身这种异乎寻常的可塑性（plasticity）和灵敏性（sensitivity），人类既能更多地利用和开发自身的外部资源，同时又能够开发和利用自身内部的精神和心理资源。

人类的大脑不仅超级发达，而且超级活跃，总处在无休止活动之中。所以，人类的智力能源储备就远远超出了他的生存需要，也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纯动物性的需求。这样，人类就时刻处在压力之下，他必须释放这些智力能量，除了妥善解决获得食品和有性生殖的需求之外，更需要把这些智力能量导入全新的生存方式，让它更直接、更富有建设性地贡献给最适合的文化形式，也就是象征符号的形式。所以，只有创造出适当的文化渠道，人类才能有效地开发、控制和利用自身的本性。

文化“作品”，要比手工劳动的作品地位更高一些，这是必然的。文化创造是人类活动的全新内容，它远不止包括制作和使用工具过程中双手、眼睛、肌肉的协调动作（虽说这些器官及其活动都大大地帮助了人类）：文化的创造过程还要求人类全面控制自己的自然功能，包括控制排泄器官和内分泌器官，控制住高涨的情绪，控制住为所欲为的性放纵，还要控制住自己的美梦或者噩梦。

随着人类持续不断地探索自身器官丰富的潜在能力，它的各个器

官，包括鼻子、眼睛、耳朵、舌头、嘴唇以及性器官，因而都获得了新角色。甚至他的手掌也不再仅仅是生满角质层的劳动工具了：用它可以去抚摸爱侣的肌肤，或者去搂抱婴儿贴近自己胸前，也可以做出有含义的手势，或者，还可以在集体的礼仪或规则律动的歌舞中用手表达自己丰富的情感，表达对生和死、对往事的记忆，或对未来的忧虑。制作工具技术（tool-technics），实际上只不过是生物技术（biotechnics）广大领域中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生物技术则是人类真正依靠的全套生存技术手段。

这是游走神经能量（free neural energy）给人类的一份厚礼，这一礼品在原始人类祖先那里早就享有了。A·乔利博士（Dr. Alison Jolly）新近指出，狐猿，例如环尾跳狐猴，其大脑生长发育的诱因很多，包括它们好动、贪玩、喜好打斗和经常互相梳理毛发，以及，还有它们之间日益强化的社会交往能力。比较而言，大脑发育却首先不是因为得益于使用工具获得食物等等习惯性活动。至于远古人类的生性好奇、喜好探索、喜爱模仿，以及懒散无聊、喜欢操纵他人，而且并不考虑最终报偿等等脾性，在远古的类人猿祖先那里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美国语言当中至今有一些惯用语，比如“monkey shines”（恶作剧）、“monkeying”（模仿，嘲弄），都是些最通俗的证据，这些词语都反映出猿猴有这种调皮捣蛋的秉性。我还想证明，我们甚至有理由进一步质疑：古代制造工具过程中一些标准化的动作模式本身，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一些礼制、歌唱、舞蹈的严格重复动作中衍生出来的呢？因为，在原始人类族群当中，这类祭祀活动已经非常成熟，娴熟完美几乎达到极致。比起他们制作的工具，简直要完美得多。

而且，几乎就在最近，荷兰著名历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n Huizinga, 1872—1945年，代表著作有《中世纪的消亡》，另有《明天即将降临》。1942年被纳粹扣为人质，拘押至死。——译者注）在其著作《游戏者人类》（Homo Ludens）<sup>①</sup>中提出大量证据，他想证明，

---

① 《游戏人类》，*Homo Ludens*，或者“Man the Player，”是赫伊曾赫于1938年发表的一部人类研究著作。书中讨论了游戏因素在文化和社会当中的重要性。作者采用了“游戏理论（play theory）”这样的术语，作者认为，游戏文化的基本因素，而且是人类文化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虽然还不是充分条件。——译者注

是游戏，而不是劳动，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基本元素：可见，人类最严肃的活动，文化，居然属于表演或扮演（make-believe）这个范畴。他认为，人类在这种表演活动中所从事的礼仪、模仿、运动、比赛、戏剧活动等，都能让人类暂且脱掉自己身上那些挥之不去的动物性特点。说至此，我更想补充一句，就体现这种进步效应而言，最好的活动莫过于人类那些原始礼制。因为，在这些活动中，人类扮演的完全是另一种全新的动物。就是说，远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去改造自然环境的时候，他们却已经能够创造出一种微型小环境，亦即象征性游戏的特定小场合；在这种场合中，人类生活的每种功能，都要按照人类的新标准严格予以重新塑造，就如同在游戏和竞赛活动中严格遵守规则一样。

赫伊津哈这篇论文《游戏者人类》的论点一经发表，立即引起轰动。该文译成其他文字过程中，译者自己首先非常震惊，于是修改了作者原来的表达方式。作者原意是说，一切文化本质上都是娱乐的一种表现形式；译者却将其改成了一种更浅显易懂、约定俗成的表现形式：游戏是构成文化的一种元素。但是，当今西方思想界却有一种先人为主、根深蒂固的见解，就是：人类既非智人（*Homo sapiens*，人类进化距今最近的一个阶段，就是包括现代人在内的智人阶段。可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早期智人生活在距今约 25 万年前，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晚期智人在解剖结构上属于现代人，大约距今四五万年前开始出现。在晚期智人阶段，人类的分布范围才开始扩大，从旧大陆到达了澳洲和美洲。——译者注），也不是游戏人类（*Homo ludens*），而首先是“工具制造者人类”（*Homo faber, man the maker*）；而且就连法国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 年），也持这种观点。而且，19 世纪的考古学者几乎也都坚信，石器工具和武器在人类生存竞争当中发挥着首要作用。这样，到了 1879 年人类旧石器时代第一批岩画在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岩洞发现的时候，一经公布，立即遭到了所谓“有资格权威人士”不假思索地同声严厉谴责，说这些报道是无法无天的骗术、是欺人之谈；理由是，冰河时期的原始狩猎先民没有这种闲情逸致，更没有这么高超的才干，能够创作出阿尔塔米拉岩

洞内如此精美的艺术作品。<sup>①</sup>

可是，无论如何，大脑都是智人拥有的极其独特的财富，而且程度超群：智人大脑发育的实现，基于人体全部器官的使用，而不仅仅是双手的使用。如今对以往陈旧的技术至上论调重新进行审视，我倾向一种更加大胆的论点：我认为，人类发明、创造以及改变自然环境活动中的每一个阶段，与其说是为了增加生活资料的供给，或者还有为了控制自然界这些目的，还不如说是为了开发利用人类自身极其丰富的有机生物资源，是为了体现和发挥自身的潜在能力，最终是为了更充分实现自身超越生物性的更高追求和理想。这些目标则不是一般生物所具备的。

在没有遭遇恶劣环境压力和干扰的时候，人类那些精雕细刻的象征性文化创造活动，主要目的是为了回应一些更紧迫的需求，而非用来控制自然环境。而且，我们还必须看到，人类这些象征性文化活动能力大大超前于这些紧迫需求，且长期以来都发展得更快。社会学者当中，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sup>②</sup>特别值得大家感谢，他就着重指出了上述事实，非常强调人类能够“用脑（minding）”，以及，能够“创造象征符号”（symboling）。其实，他无非让当代人重新看到了文化人

---

① 这里使用术语较多，稍显凌乱，特如下解释：Homo faber 系拉丁文，意思是 Man the smith，意思是“工匠人类”，英文也可译为“Man the Maker”，意思是“制造工具的人类”。用以指称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包括约翰·阿连特等科学家所定名的“智人”（Homo sapiens）。含义是指人类能够通过工具控制环境。亨利·伯格森在1907年发表的《创造性进化》（Creative Evolution）一书中，进一步给人类的智能水平明确定义为：创造人工物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特别是采用工具制造工具的能力。拉丁文献中一些作家，比如 Appius Claudius Caecus 则更用这一概念和术语指称人类控制命运和周围事物的能力，进而产生了拉丁文的名句：Homo faber suae quisque fortunae（“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卡尔·马克思接续富兰克林的引用，也在《资本论》当中引用了“人就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样话语。所以，在文化人类学里，这两个概念，Homo Faber，以及 Homo Ludens，就成为一组对偶的概念和术语，对于人类起源看法各有侧重；前者侧重工具制造，后者则侧重娱乐和消遣活动。——译者注

② 莱斯利·怀特，1900—1975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支持文化进化理论，尤其新进化论观点；创办了密歇根大学的文化人类学系，1964年担任美国文化人类学会主席。——译者注

类学的杰出创始人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sup>①</sup>当年那些慧眼独具的见解。

讲清楚这些前提之后,我们就不难看出,语言的进化,在人类进一步进化过程中的作用,自然就比工具制造——哪怕是砍出山那么大一堆石斧——具有无法比拟的重要性了。因为,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和互相沟通交流的最基本方式。人类使用工具过程中器官的协调运动还是比较简单的;而对比来看,创造出能够表达复杂意念的语言,就要求许多器官十分复杂的协调运作,这无疑是个更加高级得多的进步和成就。而且,这一成就无疑耗费了古人类很长的时间、精力以及脑力创造。可见,这一创造活动的最终集体产物,语言(spoken language),在人类文明破晓的时刻,应当看做是了不起的成就,真要比古埃及和古美索不达米亚工具制造的总集成,还要复杂、精制不知道多少倍。

可见,假如把人类主要看做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那就无异于遗漏和忽略了人类发展历史上一个重要篇章。我反对有关人类起源的这种毫无生气的工具论,而且想进一步发挥我的观点。我认为,人类首先还是一种创造自己大脑(mind-making)的动物,能自我操控(self-mastering)的动物,以及,能够进行自我设计(self-designing)的动物。而且,人类全部活动的主要轨迹,就都留在了它自身生物学的构造之中,更留在了他们的社会组织形态之中。因为,离开了这种社会形态,人类简直无从体现自己的真实存在。所以可以这样说,人类在未能成功改变自身之先,他对与周围物质世界根本无能为力,当

---

① 爱德华·泰勒,1832—1917年,原系英国文化人类学家,被尊奉为文化进化学说的代表人物。在其主要著作《原始人类文化》(Primitive Culture)以及《文化人类学》(Anthropology)当中,他在查尔斯·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厘定了学科框架。他相信,人类社会和宗教的发展,都有其合理的功能基础和根源,而且,他认为这种根源是普遍存在的。许多人认为,泰勒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学科的奠基人,他的学术著作和观点都在19世纪文化人类学学科形成的重要时期发挥了重要而持久的贡献。他相信,研究历史和人类史前史,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改良英国社会。他还重新引进了animism(泛灵论)这个术语并予以普及和通俗化,这一概念的意思是“一切事物,包括一切非生物以及自然现象,都有灵魂存在。”并且,他认为,泛灵论就是宗教能够诞生的第一位内容和基础。——译者注

然也就几乎什么也改变不了。

在人类这种自我发现和自我转变过程中，制造和使用工具，从其狭隘意义来看，充其量也只是个辅助手段，而不是人类发展进化过程中的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因为，技术手段，直至我们这个时代为止，始终是人类文化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未与文化彻底脱离。而人类却在这个文化整体中始终发挥着主体作用。技术这一词语的古希腊文 *tekhnē* 就很典型，它的含义并不把手工业生产与“精细艺术”或者象征艺术互相分离。更何况，人类历史的多半时期内这两个方面根本无法分开；其中一部分代表着文化的客观条件和功能，另一半则体现着人类生存的主观需求。

其实，技术，从其起源时刻开始，就与人类本质属性互相联系。并且，人类的这一根本属性，已经体现在其生产活动的每一方面。可见，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以生命、生存为中心的（*life-centered*），而不是以劳动生产为中心的（*work-centered*），更不是以权利为中心的（*power-centered*）。正如在其他任何生态学组合关系中的情形一样，人类各种各样的利益和目的，各种各样的生物学需求，都制约着有机生命整体上的每个部件，因而任何部件都不可能发育过度。我还试图证明，虽然语言是人类最主要的象征意义表现手段，语言却与机器同源，它也是从一个与机器发展完全相同的根底产生出来的：在人类早期大量重复举行的礼制活动中，在面对大脑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中，人类出于自我调控和自我保护需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有序观念和有序状态。

所以，我并非要诋毁和贬损技术的作用，而只是想证明：人类内在的精神组织特性一旦形成，技术手段就会支持和放大人类的表达能力。按照这一推理，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专业本领，从效果上就成为很及时的矫正手段，矫正着语言给人类提供的无节制的发明创造潜力。若不然，这种潜在能力很可能把人类自我放大到一个很不适当的程度，甚至还会诱使人类以神奇的言语方式取代原本卓有成效的劳动能力。

沿此推论，我们看到，人类有一项很具体的进化成就，这成就让人类与最贴近的类人猿亲属也迥然不同，这就是人类已经形成的新型自我（*new self*）：不仅在外貌上，还是在行为上、在生活规划上，都

10 与人类的动物性祖先分道扬镳了。而且，随着这一分化逐步扩大，那些确定无疑的“人类身份特征（human identification marks）”的总数量也大大增加。这样，人类就加速了自己的进化历程，以文化作为介质，在较短时间跨度内实现了其他物种需通过生物进化漫长途径和过程才能很费力实现的巨大变化。而且，对照人类文化进化方式来看，这种生物进化过程的后果是很难纠正，很难改进的，同样，也是很难抹掉的。

可见，人类之所以最终成为人类，主要在于人类自己的自我演变能力（self-transformation），他们一群一群地，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一种文化一种文化地，逐步演变成了人类。这种自我演变的能力，不仅确保人类没有在其发端的动物状态上永久停止固定；而且，还解放了人类自身发展进化最为优良的器官——大脑，让大脑除考虑物质生存之外，也开始筹划新的方向和内容。所以，人类的主导特性，能够支配其他特征的核心特征，就在于人类的这种自觉的认知能力，这种有目的的自我意识（self-identification），自我演变，以及，最终自我觉悟（self-understanding）的能力。

人类文化的每一种表现形式，从礼制到语言文字，从衣装仪容到社会组织，无不最终服务于人类有机生命重新塑造这一任务的，无不服务于人类个性的表达这一使命。假如说，这一明显特点，我们如今真是认识得太晚了，那可能要归罪于当今那些大量的、泛滥成灾的艺术、政治、技术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它们认为人类即将丧失这一特性，不是变成一种更低等的动物，而是一种无形制的（shapeless），类似变形虫似的，非实体的东西。

在重新整理以往有关人类发展进化的一些代表性陈旧意见过程中，我有幸吸收了多年来生物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发现的大量证据。这些见解至今还没有彻底批评过，甚至也没有充分阐释过。当然，我很清楚，虽然我依靠这些实质性证据提出我的主题和结论，尤其是这些资料本身可能引出的推论，却都很可能遭遇很有道理的质疑。因为，无论我的论点或是这些证据本身都有待完全客观、审慎的考察和检验。其实，尽管从一开始我就很想批驳这些占统治地位的陈旧论点，起初，我还是十分尊敬地接受了它们。因为我知道，暂时找不到其他任何论

点。这一局面我已没必要再三说明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当今人类几乎无例外地执迷不悟陷入对技术文明的依附，甚至不顾自身健康，甚至不顾自身安全，不顾自己精神的健全和平衡，甚至不顾人类将来发展可能出现的悲剧结局，而一意孤行……对此，我既找不到答案，也没有线索。于是我就不得不重新考察和思索人类本质，人类本性；同时，还考察了这种人类背景上的技术文明发展历程。

可见，原始人类不仅能够发明（自身躯体以外的）外部工具，尤其还能对自身身体器官进行重塑。所以，我除了发现人类原始状态中这些发明创造能力之外，还有意识地沿着另一条刚刚被照亮的道路，探索了人类的非理性特点；结果我发现，这条脉络同样也很壮阔，很漫长；它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全过程，而与人类的理性特点相违背，不符合人类作为功能理性动物的遗传特性。甚至，在与其他一些类人猿相互比较时我们就会发现，并且会毫无偏见或恶意地指出，人类具有非常突出的非理性特征。稍加观察就会发现，人类发展进化过程中显然呈现出一种长期取向：犯错误、调皮捣蛋、祸害别人、胡思乱想、错觉幻觉，以及，所谓“原罪（original sins）”，甚至还有社会性的非理性行为，包括人殉祭祀、合理合法的折磨和虐待等等。可见，人类在逃脱了生物学上的凝固不动的、不发展不进化命运的同时，却丧失了与生俱来的人性以及精神稳定感；而这些稳定感却是其他一些不像人类那么幸运的物种所都能享有的。而人类在告别那些最为古怪反常的动物取向的同时，当然也打开了通往进化的宝贵新领域，这是数十亿年纯粹生物进化历史从未尝试和探索过的新前景。

人类放弃自己纯动物性特征（mere animalhood）之后，随之而来的不幸是很多的；但是褒奖同样也很多。比如，人类非常喜欢把幻想和设想、愿望与设计、抽象思维与思想意识，都混同于日常经验和常识。而如今我们发现，人类这一特点恰是他无限创造力的一个重要源泉。非理性和超理性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界限。如何对待自身这种颇具双重性的资财，始终是人类的重大难题之一。当今对于人类科学和技术成就，存在种种功利主义的肤浅解释和态度，根源之一就是，这些见解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侧面，本质上是开放的。它既可以走向美妙卓越的理想宏愿，又可能走向魔鬼